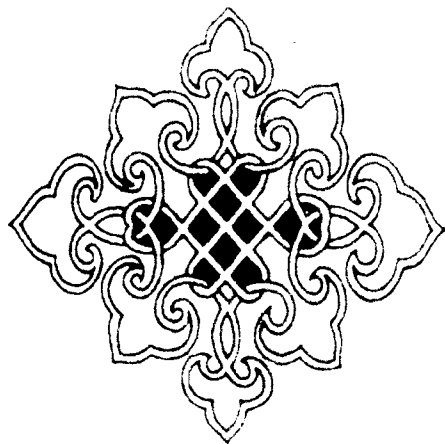


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

钱明 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本书由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
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序 一

柴田 笃

自从王守仁经过在龙场的体验而鲜明地确立自己的思想立场后,历史已过去了近五百年的岁月,阳明学就是以此事件为契机而悄然登场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王阳明所透露出来的强烈的思想信息,给了当时及以后的许许多多人以无穷的震撼与魅力。那么,这其中的内在根源究竟是什么呢?众多的研究者为揭示其真相而殚精竭虑,本书著者钱明便是其中的一个。

本书由上、中、下三篇及附录组成。综观全书,可以看出,著者把握住了阳明学的形成与展开这一根本性的主题。对于在思想史上有巨大影响的王阳明学说是经过怎样的思想脉络而形成的,阳明思想到了其后学那里又是怎样并且何以走向分化的,阳明学之展开的思想史意义到底在哪里,等等,都是从中国近世哲学史的角度需要深入考察并应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钱明氏正是在中国、日本至今为止蓄积的阳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旁征博引,潜心钻研,对上述课题进行了详实而公允的论证。这是本书给人的深刻印象之一。

钱明氏在本书《后记》里说,自己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完全是一种巧合。他进入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中心的研究群体或许也是一种偶然。甚至可以这么说,无论其展开以阳明学为核心的明代思想研究也好,还是到日本留学也好,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如今在通读了这部凝聚着著者多年的阳明学研究成果的时候,

在目睹了本书相当宽泛的史料引证以及对所涉及的中日两国庞杂的研究文献进行缜密考证与详细注释的时候,就不能简单地用偶然一词来解释了。其中可称之为必然性的东西是显而易见的。对此,怦然心动的又岂止我一人!那么,又是谁引导他走到这一步的呢?

钱明氏的研究功力,是在中国大陆“文革”结束后新的宋明思想研究的潮流中渐渐积攒起来的。特别是长期以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所进行的实实在在的文献学研究,给了他强有力的研究手段。这当中,参加《黄宗羲全集》、《王阳明全集》等古籍编纂工程,从而积累起版本校勘、文献考证、原典梳理方面的坚实基础,乃是磨炼其研究功夫的重要途径。而著者长年调查与收集王阳明未刻散佚资料所取得的成果,则在本书的考证及附录部分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另外,著者曾经参与的中日两国研究者协同进行的对王阳明遗迹的田野考察工作,可以说对立体把握王阳明及其时代脉搏也具有极大的意义。当然,著者趁前后两度赴日留学的机会,通过与日本研究者的广泛的学术交流,把日本在宋明思想研究方面的深厚积累,消化吸收,融会贯通,也使自己增加了学术见识,拓宽了研究视野。

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王阳明则曰:“学者,学良知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钱明氏的研究就是以此为着眼点的。五百年前的人们,思考的是什么?追求的是什么?是如何活又是如何死的?学习历史,思考过去,无非是为了更好地思考现实的问题,更好地探寻今日生命的意义。所以有人说:“研究是其目的,而出版则是其余业。”我想,在钱明氏那里,重要的乃是其研究本身,并且通过这样的研究体验人生的意义。当然,研究的成果以现在这样的形式问世,从而成为众人共享的财富,是值得由衷庆贺的事情。不过,怎样从长期从事的阳明学研究中,从已经挖掘出来的堆积如山的资源中提炼真金,使之光芒四射,则是著者今后需要继续努力的

事情。

本来这篇序文,应由钱明氏在日本的德高望重的恩师冈田武彦博士亲撰。这是因为博士对钱明氏有谆谆教导与亲切关怀之恩,而钱明氏对博士亦怀着深深的敬慕之情。可以说,如果没有以中日两国的阳明学研究为平台,也就没有本书的诞生。博士由于健康方面的原因,嘱小生代言。然汗颜的是,余只能挂一漏万,聊表老师之深意。前后算起来,我与钱明氏的交流也已超过十余年。他在与人交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诚实、正直之形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著者持之以恒的探究与独到精深的阐述,我表示由衷的敬意。至于该书的学术价值和意义,自有待社会和历史的公正评价。

2002年4月于日本宗象寓所

序 二

王凤贤

我怀着喜悦的心情读完了钱明著的《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这部专著的书稿,觉得作者掌握和运用的史料极为丰富,对于自己阐述的学术观点,不仅在正文中旁征博引,而且通过加注,对不同学术观点作了介绍,对资料来源及版本作了说明。这种严谨扎实的治学态度,理所应当受到称赞。这在我是意料之中的,因为我非常了解作者在这方面的优势。

一则,作者曾留学日本九州大学,拜国际著名的汉学家和阳明学专家冈田武彦教授为师,后来又多次应邀赴日本作学术交流和访问考察,近期又在九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多年来,他十分重视海内外学术界的阳明学研究动态,注意积累历史的和现实的有关资料。

二则,作者精通日语,经过长期进修和实际运用,不论在笔译还是口语方面都已达到了相当熟练的水平。他独译或合译过冈田武彦等先生的学术著作四部,并翻译过许多日文的学术论文和资料。他利用掌握日语的有利条件,阅读和搜集了大量阳明学研究方面的日文资料。

三则,作者参与了《黄宗羲全集》和《王阳明全集》的编辑校点工作,特别是承担了《阳明全书成书经过考》和《〈王阳明全集〉未刊散佚语录诗文汇编及考释》的任务,而且《王阳明全集》中新增的十数万字史料也主要由他提供,可谓功不可没。

四则,作者自始至终参与了中日学者联合开展的王阳明遗迹的系统考察活动,他在承担繁重的翻译和组织管理工作的同时,注意积累考察所获的有关资料,并重视王阳明家世和生平方面所发现的新资料,为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方便。诚然,从搜集积累资料到准确而不是随意地使用资料,毕竟是一个科学研究的过程。作者的这部专著,证明他在科学地运用这些丰富资料方面是做得成功的。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阳明学研究是个传统课题,长期以来,海内外学术界发表的研究论文和著作已不计其数,特别是近年来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时有问世。在这种情况下,要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具有新意和深度,并非易事。面对这种挑战,作者发挥自己的优势,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周密梳理,对学术观点的比较研究,从不同视角观察思考,终于在自己研究的主题范围内,发前人所未发,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诸如,关于王阳明先世实出于东晋王导的“乌衣大房”系脉而不属于史书所载的王羲之一脉的考证;关于“建功”与“成圣”为王阳明立志的两个方面及其由“介入”转向“脱俗慕仙”之原因的分析;关于王阳明中后期思想“两次突破”的论述;关于王阳明《大学》观的演变及其良知说的“情感化和个性化”的揭示;关于阳明学分化的渊源、思想基础以及“两大系统”与“五个流派”的划分与探索;关于二王(王艮、王畿)思想性格、思想内蕴之同异的精辟剖析;关于罗念庵学术思想演变的“四个时期”的划分与评述;关于阳明后学“主意说”的演进及其在王学修正思潮中的地位与影响的探讨,等等,都表现出独具的学术创见和研究深度。

作者对“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这个课题,是着力于抓住主要线索而展开探索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主题的涉及面还可以更广一些。同时,作者的有些学术观点也只能说是一家之言。我们期待着阳明学研究有更多高水平的成果问世。

2002年4月于西子湖畔寓宅

目 录

序 一	紫田笃(1)
序 二	王凤贤(1)

上篇 阳明学的形成

第一章 王阳明的世家及后裔	(1)
第一节 先世:姚江王氏秘图山派系的由来	(2)
第二节 家世:祖辈之世德及对阳明的影响	(4)
第三节 家族:门第之中兴及予阳明的教诲	(7)
第四节 后裔:萧墙袭爵之争及家族的衰微	(11)
第二章 王阳明早期思想性格的形成	(16)
第一节 介入与超然	(17)
第二节 成圣与求仙	(21)
第三节 山东乡试与龙场悟道	(30)
第三章 王阳明中后期思想的嬗变	(38)
第一节 从诚意到致(良)知	(45)
一、用“致知”代替“诚意”	(56)
二、“意”之内涵的转变	(60)
三、对“格物”的全新解释	(63)
四、“万物一体”的《大学》观	(64)

第二节	从天理到良知	(66)
第四章	王阳明与湛甘泉思想的异同	(85)
第一节	王湛关系的两个阶段	(88)
第二节	王湛之间的两次论战	(96)
第三节	阳明门人与甘泉的关系	(101)

中篇 阳明学的分化

第一章	分源别派	(106)
第二章	分化变异的思想基础	(116)
第一节	“流行”与“收敛”	(120)
第二节	“自然”与“主宰”	(122)
第三节	“事上工夫”与“心上工夫”	(125)
第四节	“本体上说工夫”与“工夫上说本体”	(128)
第三章	各流派的主旨与纠葛	(132)
第一节	虚无派	(132)
第二节	日用派	(137)
第三节	主静派	(144)
第四节	主敬派	(148)
第五节	主事派	(151)

下篇 阳明学的展开

第一章	二王思想的异同及其特质	(158)
第一节	引论	(158)
第二节	思想性格的异同	(163)

第三节 思想内涵的异同	(171)
第二章 罗念庵思想的演变及其对阳明学的修正	(182)
第一节 早期思想:致虚主静说	(184)
第二节 中期思想:良知现成说	(190)
第三节 后期思想:良知归寂说	(197)
第四节 晚期思想:经世致用说	(205)
第三章 阳明学派主意说的形成与终结	(211)
第一节 对“意”之概念的历史考察	(211)
一、“毋意”与“诚意”	(212)
二、“意”与“志”	(218)
三、“意”与“念”	(219)
四、“意”的特质	(222)
第二节 阳明后学的主意趣向	(223)
第三节 王一庵的主意说及其对泰州王学的修正	(228)
一、“意近乎志”	(234)
二、“意是心之主”	(235)
三、“独即意之别名”	(237)
第四节 刘念台的创论与主意学说的构成	(244)
一、“意为心本”	(246)
二、“知中有意”	(249)
第五节 主意说在王学修正思潮中的地位	(251)
一、主意说的基本特征	(251)
二、主意说对王学的修正	(252)
三、主意思潮的影响	(253)
附 录	(257)
一、《王阳明全集》未刊散佚诗文汇编及考释	(257)

二、主要参考文献	(326)
后 记	(334)

上篇 阳明学的形成

第一章 王阳明的世家及后裔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歿于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谥文成。祖籍余姚，青年时随父迁家至山阴(今绍兴)，后在离越城十公里的宛委山阳明洞天结庐，自号阳明山人，学者称其为阳明先生。他二十八岁举进士，授刑部主事，后改兵部。曾知庐陵县，历任吏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及南京太仆少卿、鸿胪寺卿。正德末年以左金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平息动乱，征讨宁藩，因大功而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封为新建伯。晚年奉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两广等地，病归途中，死于江西南安(今大余县)，旋归葬于绍兴花街鲜虾山南麓(今属绍兴兰亭乡)。

王阳明是明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其武功足以定乱，文治足以兴邦，学术足以承先启后，言行足以化民导俗，故在德行、事功及学问上，皆为时贤难望其项背。如从其治学之精密广博、事功之超卓远大及风骨之豪迈嶙峋来下评语，则可以肯定地说，儒家所谓“立功”、“立德”和“立言”三不朽者，阳明盖兼而有之也。

中国近代学术大师梁启超说过：“孟子知人论世之义，以谓欲治一家之学，必先审知其人身世之所经历，盖百家皆然。况于阳明先生者，以知行合一为教，其表见于事为者，正其学术精诣所醇化也。”(《饮冰室合集》五，《文集》之四十《阳明传及阳明先生弟子录序》)而在一个尊重家世传统的中国古代社会里，祖先的行为成就

和人格表现,往往会对后世子孙意趣志向的启发和培养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若要深入探讨王阳明思想之发展过程及日后能成为一独立思想体系之原由,不仅要把阳明自己的身世行状、思想历程了解清楚,而且还要全面了解阳明之思想渊源与其先世家族的关系。

第一节 先世:姚江王氏秘图山派系的由来

钱谦益《王氏族谱序》云:“王之姓,太原、瑯琊、东海、北海,指不胜屈。建炎南渡,谱系具在。”(《牧斋有学集》卷一五)然追根溯源,王氏之后裔,又都源自山西太原,而分支于山东瑯琊(今临沂胶州地区)。太原王氏开族源自黄帝,出于姬姓,得姓则来自周灵王太子晋一派。晋“受封于魏为梁王,其后以爵为氏,遂姓王”(《王氏宗谱》)。其子孙繁衍,迄至秦代名将王离兵败殉国后,长子元以渭水流域不能久居,于是举家迁至瑯琊,成为王氏瑯琊始祖。东汉时,瑯琊王氏隔五世有王袭次子王吉迁居皋虞(今山东即墨县东北)。光和二年(179)以罪入坐,父子二人逮死狱中,事见《后汉书·宦者传》(卷一〇八)。王吉六世孙王融徙居临沂,《世说新语》遂以王融为瑯琊临沂王氏始祖。除太原、瑯琊二隆盛地望外,据《广韵》记载,王氏之分布尚有十九地望,至宋代已遍及大江南北。王阳明之祖先即为瑯琊世代所衍派者,其家族世系最早可追溯到王融次子王览,故黄绾在《阳明先生行状》中称:“其先瑯琊人,晋光禄大夫览之后。”(吴光、钱明等编《王阳明全集》第1406页。以下凡引此书皆简称《全集》并注页码)

王览(205—278),字玄通,为世称二十四孝中“卧冰求鲤”王祥之异母弟,以孙王导仕晋贵,追赠光禄大夫,谥曰贞。览“少笃至行,服仁履义”(《晋书》卷三十三《王览传》),以孝友恭恪而闻名,后世子孙受其影响至巨。因而至今临沂的名胜地“五览祠”内尚奉祀

有王览像。览生六子，“曰裁、曰基、曰会、曰正、曰彦、曰琛”，而“裁生导、颖、敞，基生敦，会生舒远，正生广、旷、彬，琛生棱、侃”（参见清蒋超伯《南浔楷语·瑯琊王氏》第56页），其中以王导、王敦最为出名。

王导（276—339），字茂弘，历任东晋元、明、成三帝丞相。西晋末，与堂兄王敦（266—324，字处仲）为琅邪王司马睿献策移镇建康（今南京），并举族南渡。司马睿称帝（元帝），以导为相、敦为大将军，时称“王与马，共天下”，兄弟二人为稳定东晋在南方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①。自是王氏一族，乃盛于江左。故后人修族谱，均将王导誉为瑯琊三王之一（另为王览、王羲之），其后裔则追尊王导为乌衣大房一世祖，而王导的族弟王旷即为晋代书圣王羲之之父。

传至北宋初年，王导后裔、乌衣大房二十三世孙王佑（924—987），曾植三槐于庭，并追尊其祖父王言（869—930）为“三槐一世祖”。王佑曾孙王巩（1036—1103）与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交友，苏为之写有《三槐堂铭并序》。王阳明所属的“姚江秘图山派”即为“三槐堂”系之支派，故《世德记》谓：“先世尝植三槐于门”（《全集》第1383页）。

王巩曾孙王道于宋靖康、建炎时扈驾南渡，赠爵余杭县开国男，居余杭之仙宅界，遂为王氏余杭派之始祖。王道次子王补之，字咎卿，号全甫，宋太学上舍登第，知绍兴府，与弟辅之迁居上虞县达溪之虹桥，是为虹桥派。补之曾孙王季，字万五，号质庵，系乌衣大房第三十三世，即阳明十世祖，又由达溪迁居余姚秘图山，是为姚江秘图山派之始祖。季生四子，三子子俊；子俊生五子，长子士元；士元生三子，长子纲，是为阳明六世祖。

^① 后王敦以司马睿抑制王氏势力为由，欲举兵谋反，命郭璞（276—324，字景纯）卜筮，璞谓其必败，因而为敦所杀。明正德十五年，王阳明作《纪梦》诗并序，为忠臣郭景纯见伸，而对己之先祖王导兄弟则大加挞伐（参见《全集》第777—778页）。

由此可见,王阳明先世实出于王导的“乌衣大房”系,至宋代又归属于王言的“三槐堂”系,自王季从上虞迁徙余姚后,即属“姚江秘图山派”系。该系脉不仅与王羲之一脉干系甚微,而且亦非经由山阴迁徙余姚。故陆深所谓“其先出自晋光禄大夫览之曾孙右军将军羲之,由瑯琊徙居会稽之山阴,后二十三代孙迪功寿又自山阴徙余姚”(《全集》第1391页),以及钱绪山的《阳明年谱》之记载(《全集》第1220页),皆有误^①。

第二节 家世:祖辈之世德及对阳明的影响

王阳明本系所属的《姚江秘图山派王氏宗谱》现尚未发现,然据同属王氏乌衣大房系及此后的三槐堂系的旁系宗谱,如《姚江开元王氏宗谱》(光绪二十九年存本堂刻本)、《余姚孝义官人宅王氏宗谱》(民国二年三槐堂刻本)等记载,乌衣大房系传至阳明十世祖王季时,始自剡溪上流的达溪徙至余姚,遂为余姚人。阳明即为乌衣大房系的第四十二世孙和姚江秘图山派系的第十世孙。然到阳明六世祖王纲开始,其祖先才有较详史料见于《世德记》等文献。

王纲(1302—1372),字性常,一字德常,弟秉常、敬常,并以文学知名,而纲“尤善识鉴,有文武长才;少与永嘉高则诚族人元章相友善,往来山水间,时人莫测也”(张壹民《王性常先生传》,《全集》第1380页)。诚意伯刘伯温未显时常造访王纲论道,纲谓之曰:“子真王佐才,然貌微不称其心,宜厚施而薄受之。老夫性在邱壑,异时得志,幸勿以世缘见累,则善矣。”(同上)其卓然之气节、出世之志向,于此可以想见。后刘基竟荐纲于朝。“洪武四年,以文学

^① 参见诸焕灿《姚江王氏迁居绍兴、争嗣爵位三考》,《余姚乡贤论》第2辑,余姚市乡贤研究会1992年编。

征至京师,时性常年已七十,然齿发精神如少年,上问而异之,亲策治道,嘉悦其对,拜兵部郎中。”(同上)未几,潮民作乱,太祖遂令纲为广东参议,督运兵粮。纲致书家人诀别,并携子彦达同行。至则单舸往谕,潮民感悦,咸扣首服罪,于是威信大增。返回增城时,遇海盗曹真截船,要拜纲为帅。纲不从,谕之以逆顺祸福。贼不听,还设坛迫纲坐于中堂,日夕罗拜。纲骂不绝声,遂遇害。时彦达亦随入贼中,从旁哭骂求死。贼欲并杀之。然贼首曰:“父忠而子孝,杀之不祥。”(《全集》第1381页)遂令其缀羊革裹父尸而出,得归葬禾山。禾山在余姚市西北二十里,今为马渚区青山乡境内。洪武二十四年(1391),御史郭纯以其事上奏朝廷,得祀庙广东增城,以励忠贞。嘉靖七年(1528)十月,阳明上书告病,在归程途中路经增城湛甘泉故居,提诗于壁,诗中有“我祖死国事,肇祗在增城;荒祠幸新复,适来奉初蒸”(《全集》第799页)之句,流露出了缅怀先祖、显彰忠孝大义的真挚情感。后阳明又为文祭之,以“表扬忠孝,树之风声……宣流王化之盛美”(《全集》第966页)。对于王氏祖孙对粤人教化之功德,清儒檀萃评价颇高,认为阳明先祖及阳明本人俱效绩于粤,且宦业亦始于粤,“有造于粤者累世矣”^①。故至今粤城东横街之三贤祠和朝天街旧北隅社学之阳明祠均奉祀阳明,春秋致祭以昭其德。也许正是由于阳明祖孙累世之教化的缘故,才使得阳明的广东、海南弟子在与当时较发达的浙江、江西等地的比较中,并不显得逊色多少。

王纲歿时,阳明五世祖王彦达年仅十六,虽以荫得官,然痛父以忠死难,故躬耕养母,粗衣恶食,终生不仕,“人称孝子”(《全集》第1387页),“有隐操”(《全集》第1381页),因居秘图湖之侧,号为秘湖渔隐。曾悉取先世所遗书付子与准曰:“但毋废先业而已,不

^① 《楚庭稗珠录》卷五《粤珥下·阳明三世有功於粵人》;转引自张克伟《王阳明先世及家世考实》(《浙江学刊》1991年第3期)。

以仕进望尔也。”(《全集》第1381页)为此,阳明对先祖有颂扬之辞谓:“父死于忠,子殚其孝,各安其心,白刃不见,又知有一祀之荣乎?”(《全集》第966页)

王与准,字公度,阳明高祖。少时即秉承父之遗志,闭门力学。乡里后进或来从学者,辄辞曰:“吾无师承,不足相授。”后去从四明赵先生学《易》。赵奇其志节,妻以族妹并劝其出仕。与准以赵“遁世无闷”之海而谢绝之。尝得箴书于异人,为人箴,无不奇中。县令亦遣人来邀箴。与准取箴书对使者焚之曰:“王与准不能为术士,终日奔走公门谈祸福。”令大怒。与准无奈逃入四明山石室中,不归者年余。时朝廷访求遗逸甚严。使者至余姚,欲起与准。令污之曰:“王与准以其先世尝死忠,朝廷待之薄,遂父子誓不出仕,有怨望之心。”使者遂拘押与准三子为人质,入山求之。与准深遁,坠崖伤足,得免。使者见与准次子杰之贤,谓之曰:“足下不仕,终恐及罪,宁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乃让杰备邑庠弟子员。后谓人曰:“吾非恶富贵而乐贫贱;顾吾命甚薄,且先人之志,不忍渝也。”又曰:“吾非伤于石,将不能遂栖遁之计,石有德于我,不敢忘也。”故自号“遁石翁”。与准精究《礼》、《易》,著有《易微》数千言,与父彦达“皆以德学为世隐儒”(参见胡俨《遁石先生传》,《全集》第1381—1383页)。

王杰,字世杰,阳明曾祖,因先世尝植三槐于门,故自号槐里子。杰自为童子,即有志圣贤之学,年十四,已尽通四书五经及宋儒之说。因父命而补邑庠弟子员。比入试,见众人皆散发袒衣,叹曰:“吾宁曳履衡门矣。”(戚澜《槐里先生传》,《全集》第1383页)遂归,不复应试。后又数次以亲老辞,躬耕受徒,以养其母。母歿乃以名儒宿学应贡,入南雍,官至编修。杰言行一以古圣贤为法,尝谓门人曰:“学者能见得曾点意思,将洒然无入而不自得,爵禄之无动于中,不足言也。”(《全集》第1384页)曾著有《易说》四卷、《春秋说》五卷、《周礼考证》六卷,时人每读之,“以为近世儒者皆所不及”